



抓她，李惠明在她姐姐掩护下回到成都，通过国立四川大学同学、共产党员江竹筠、冉正芬的关系前往重庆。

李惠明虽然离开了成都，但她为大邑输送干部的计划仍然继续进行。原来，在她离开国立四川大学时，曾向当时的“民协”领导人之一、农学院助教陈璧云详细介绍了大邑的发展情况，要陈在学生运动中物色合适对象输送下乡。她还强调青年学生下乡的意义和艰难，要求下乡同学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。陈璧云没有让她失望，按照她的说法物色了学运中一些骨干如国立四川大学的陈万堂、李安澜、罗永由，华西协合大学的赵子信等于8月1日奔往大邑。随后党组织又安排了国立四川大学等院校的龚培艺、杨祚惠、杨泽民、董国福等一大批人到大邑农村充实当地武装力量。

李惠明还积极发动她的亲属支持革命斗争。她的大姐李惠贤在大邑城关北街的住处，二姐在名山的住处，都成了党组织的重要联络点。这些亲戚不但支持革命，还通过他们的关系扩大党的影响，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事。

转战渝州

1947年8月，李惠明从大邑撤到了重庆松花江中学做学生管理工作。由于她的努力，松花江中学一度变为民主进步的学校和党的活动基地。

早在1946年下半年，李惠明动员了原松花江中学进步教师杨修平重返学校，要他凭借原有关系，掌握松中，以便掩护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去那里工作。杨修平回松中后，按李惠明意见，采用“经济权、用人权不让”等策略，就任了校长。从此，松花江中学掩护了许多党员、盟员和进步青年，其中包括王朴、贺天熙、王德裕、马秀英、罗广斌等人。这时的松花江中学还从教学方针、内容、方法等方面进行革新，使之成为民主进步的基地。

李惠明从事松花江中学女生部管理工作时，不像一般训育管理老师那样老气横秋，摆起一副可望而不可即的冷面孔，而是和学生打成一片，把学生吸引在她的身边。她积极参加校内的周末晚会、歌咏活动、时事座谈，与学生个别谈心。不少学生在其教育熏陶下，开始变得更加关心集体和国家大事，不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了。

在重庆，她还参加了“六一社”，在中共沙磁区特支的领导下，积极从事学生运动的工作。

1948年4月，党的秘密刊物《挺进报》被破坏，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、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后叛变，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志被出卖。4月10日，敌人欲逮捕刘国志，刘却机智地脱身，匆忙中未来得及通知正要与他联系的李惠明，致使李惠明和未婚夫张国维等被特务逮捕。审讯时，李惠明一口咬定和刘国志是同学，是想通过他找工作。敌人抓不到把柄，只得把她作为嫌疑犯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。

魂兮归来

李惠明虽身陷囹圄，但从未悲观失望，依然对胜利充满信心。在狱中，她见到了大学的校友江竹筠。他们相互鼓励，共同战斗。在逆境中，她依然刻苦学习，准备一旦出狱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，为党更好地工作。她把牢房当课堂，教难友学习古典文学和外语。她的孜孜不倦与必胜信念感染了情绪低沉的难友，使她们振奋起来。每天早晨，大家就背英语、诵诗词，惹得那班看守特务百思不得其解：这些不知今天死，明天亡的囚犯，还学那些洋文和洋话干啥？

狱中的非人待遇，丝毫没有减低李惠明的革命热情。她的未婚夫张国维也被关在渣滓洞，却无法相聚。她经常惦念的是那些受刑致伤和有病的难友。有一阵子传说罗广斌要被释放，她写纸条请他转交外面的朋友，让朋友设法捎些药品进来，给伤病员治疗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，像一道闪电划破黑牢。李惠明和难友们怀着激动的心情，等待巴山蜀水的解放。人民解放军兵临山城的时候，在“一一·二七”惨案中，李惠明和与她在一起的许多革命精英，惨烈地殉难于中美合作所的魔窟中。

歌乐之山，啾啾含恨。

嘉陵之江，呜咽低回。

西蜀女杰，魂兮归来！

（王宗力 靳用春）



川大

记忆

校史文献选辑

何懋金烈士——

把闪光的青春献给人民



何懋金烈士

1949年11月27日，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，突然枪声大作，打破了黎明前的静谧。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经系1944级毕业学生、年轻的共产党员何懋金，壮烈牺牲。这位曾为四川大学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优秀的党的基层领导人，在革命生涯中用鲜血和生命，谱写了一曲曲战斗之歌。

赤子常怀忧国心

1917年3月，何懋金生于川东重镇万县河口乡晏家咀。他自幼好学，勤于思

考，5岁即随祖父吟诵诗文。他8岁转入新学，12岁考入万县中学读初中，期期成绩优秀。

何懋金从小具有求实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。发生于1926年的万县“九五”惨案，给何懋金幼稚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。他意识到祖国正在遭受帝国主义的欺侮，中国应当自强。1937年秋，何懋金为寻求真理，告别家乡只身来到重庆，考入求精中学高中部。

其时，正值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后，全国人民同仇敌忾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。何懋金能拉会唱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歌咏宣传队宣传抗日。寒暑假回到家乡，他又邀集青少年朋友组成“抗日救亡促进团”，自任团长，教唱救亡歌曲，排演街头活报剧、画漫画、出板报。他们还利用赶场机会，在河口、让渡、凉风、杨河溪等地巡回演出，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，唤起民众，号召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为前方将士及沦陷区难民募集寒衣、筹募捐款。

1941年，“皖南事变”后，大家都为抗战前途忧心忡忡。何懋金去向在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工作的叔父、共产党员何其芳求教。在其叔父的指导下，他开始钻研哲学、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现代史，追寻自己的人生道路。

何懋金高中毕业后因病在家休息了几年。病中，他订阅了《新华日报》、《展望》、《东方》等报刊，购买了大量马列书籍，刻苦自学。他还经常到附近的农家作社会调查。1944年何懋金抱着立志改革农业的愿望，考入了迁到成都的私立金陵大学农经系。次年，他转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农经系。

用革命歌曲振奋人心

何懋金入学后，勤奋好学，刻苦钻研，不放松一分一秒，就是星期天也要到图书馆翻阅进步书籍。平时，他还经常与学校的进步教授和同学们研究、探讨中国农村经济问题，秘密阅读解放区土地改革和整风文献，如饥似渴地学习《资本论》、《大众哲学》和《新经济学》等革命书籍。他眼界大开，革命的火焰在他胸中熊熊燃烧。在校内，何懋金是党的外围组织——“中国民主青年协会”的首批成员和积极分子之一。1946年，他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他选择了为民族为人类求解放的人生道路。

此时，在国立四川大学校园内，人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位春秋一身中山装，冬



天只穿一件光棉袄、头发蓬松、面带笑容的中等身材的同学。有时，他和同学谈天说地，针砭时弊。有时，他挟着一捆捆纸卷或书籍，神态自若地从男生宿舍来到女生院。他就是国立四川大学农经系的何懋金，一个不惹人注目的党的地下工作者。

何懋金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川大学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，是四川大学党总支委员。他工作积极，作风随和，善于接近群众，无论是在党内或同学中都有较高的威信。1948年，国立四川大学党组织获得较大发展。仅他自己就介绍了十多名经过考验的同学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与此同时，他还受组织委托，担任了国立四川大学“民协”的领导工作。他组织“民协”，积极带领同学们参加各种活动，广泛联系群众，团结中间同学，争取后进同学，壮大革命队伍。他不畏艰险，宣传革命真理，传播进步书刊，使“民协”成员在斗争中发挥骨干作用，为党组织培养和输送有生力量做了许多基础工作。

何懋金对音乐有特殊的天赋和爱好。音乐是他团结群众、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，也是他突出的特点。

1947年，他发起成立了“黎明歌唱团”。这是当时在国立四川大学很有影响的进步社团。他出钱为歌唱团买钢板、蜡纸、纸张，编选进步歌曲，组织积极分子分头印刷，还亲自去校油印室与工友一起摇油印机。他经常组织同学大唱革命歌曲，宣传革命真理。尤其是他教唱的《跌倒算什么》这首歌曲，当时在激励同学不畏艰难、拼搏向上和催人奋进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每到傍晚，国立四川大学校园里常常就会响起：“山那边呀好地方”、“跌倒算什么，我们骨头硬”的激越歌声，总能听到“雄鸡、雄鸡，高呀高声唱”的豪放歌曲，吸引了广大追求进步的同学。歌唱团在校本部、新生院、工学院、先修班举办的多次演出，都座无虚席。他们在成都市区的《新新新闻》大厦举办的义卖演出，更是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，气氛极为热烈。在各场演出中，总有何懋金的节目。他很喜爱演奏刘天华的《病中吟》和聂耳的《金蛇狂舞》，他和刘光书同学的二胡合奏常常博得听众热烈的掌声。

1947年6月2日，为了声援京沪学生，国立四川大学师生在大礼堂召开了大会，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。何懋金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。

“四九”运动中冲锋陷阵

1948年4月，在中共成都市委的领导下，以国立四川大学学生为主力和中坚，以争取平价米为名，和全市大专院校一道，发动了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”运动。何懋金作为党总支委员，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。4月9日当天，有300多名同学受伤，132名同学被当场抓走，酿成了有名的“四九”血案。何懋金受党组织派遣，努力争取全川、全国人民的支持，进一步揭露敌人的罪行，更有力地打击王陵基的嚣张气焰。王陵基终于不得不无条件地陆续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。这次斗争的胜利，促进了全川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”运动的广泛开展。“四九”运动后，王陵基并未善罢甘休。这时，何懋金按照党组织的安排，不辞辛苦，不怕牺牲，日夜奔走，掩护黑名单上的一些同学撤退，使他们转移到新的岗位上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，从而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，进一步坚定了同学们斗争到底的信心和勇气。

转战农村开新篇

1948年夏天，中共川康特委决定委派何懋金负责组建“川东工作队”和工作队支部。何懋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，提出以县为基地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作掩护，开展党的工作的意见。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，他按照党的要求，组织应届毕业生中的党员，以万县籍同学为主，组建了“川东工作队”和党支部。他任队长兼支部副书记，先已在忠县师范教书的饶顺照任党支部书记。成员有唐万字、崔干平（原名崔极绪）、郝耀青、余泽民（支部组织委员），还有“民协”成员罗玉琼。蒋开萍稍后不久回到万县，也参加进来。这样，川东工作队共有7人。大家分头在各自家乡或学校开展工作。何懋金和余泽民、罗玉琼分在河口乡。

何懋金回到家乡，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作掩护开展工作。由于他平易近人，抗战时就在家乡搞过抗日宣传活动，人熟地熟，给开展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。

他首先取得了曾当过河口乡副乡长的幺叔何宋冰的支持，了解到本地理发师张成富是一个祖辈三代受苦出生的穷人，其妻也是个朴实的农村妇女。由于张成富走村串户给人理发，接近和联系群众比较广泛，是一个较好的发展对象。因此，决定由何宋冰有的放矢地去接触和启发他。在他觉悟的基础上，何懋金又用“一根筷子易折断，一把筷子折不断”，比喻组织起来、团结斗争的力量大，要张再去发动具有反抗精神的贫苦农民，从而用“农民互助会”的形式，把觉悟了



的农民兄弟组织起来。经过张的积极工作，几十名积极分子被组织起来了。1948年9月，河口乡“农民互助会”正式成立，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。何懋金在会上讲解了当前的形势，阐述了“农互会”的宗旨任务。他说：“我们组织起来了，首先，会员们要团结互助，始终扭成一股绳。还要热情关心更多的穷苦兄弟，帮助他们提高觉悟，谁受到地主和反动派的欺压，就要团结起来斗争！斗争的方针，可以软拖硬抗。”会后，会员们在他的指导下积极行动起来，反对“拉丁、拉夫、派款”。“二五减租”搞得热火朝天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连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何金门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被迫减了租。

那段时间，何懋金每天晚上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有时甚至是在狂风暴雨中，悄悄去山坡上、河滩边、烟草坡或岩洞等处召开秘密会议，研究斗争策略，发展“农互会”会员。到1949年3月，河口乡“农民互助会”已先后发展了1200余名会员，编成40多个小组，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。在紧张的斗争中，何懋金常常通宵不能回家，就住在“农互会”骨干的家里。他与广大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农民都把他当做自己的贴心人。

在何懋金的指导下，工作队的蒋开萍、崔干平二人所在的长岭乡和上复兴乡等地的农民斗争，也积极地开展起来。

何懋金见这时农民运动已经如火如荼，群众基础比较巩固，一方面与新发展的共产党员张成富、何宋冰等商量，在河口乡组织武装队伍，开展斗争；另一方面到上复兴乡去与崔干平一起动员其兄崔北川带兵起义。两处都取得了满意的结果。在河口乡，张成富、何宋冰等去做乡公所乡丁的工作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周旋，20多名乡丁均被发动起来，愿把所有枪支、弹药交给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，决心跟着党，上山打游击，迎接解放大军进川。在上复兴乡，原来在罗广文部722团当团长，因不愿打内战而想解甲归田的崔北川，经过何懋金和崔干平的耐心说服，又回到部队策划川军起义。经过党组织以及其他渠道的共同工作，1948年10月，722团在南川首举义旗，崔干平与其兄崔北川即将武器支援给党领导的游击队。后来，罗广文也在川西通电起义。

为了更好地了解解放战争形势，做好迎接解放大军进川的准备，何懋金还将一部旧收音机，改装成收报机，收听新华社的广播消息。解放军在辽沈、平津、淮海三大战役中的伟大胜利，极大地鼓舞着广大的农民群众。

英雄热血谱高歌

1949年初，成都有人被捕后经不住刑讯，向敌人供出了何懋金、蒋开萍、郝耀青等的情况。国民党四川省特委会随即“密令”万县特委会：“查成都四川大学万县籍学生蒋开萍、何懋金、郝耀青三人，在校进行共党活动，秘密组织新民主主义研究（协）会……飭该会火速派员查缉，归案法办。”国民党万县特委会主任陈治汉得令后，即布置长岭乡的中统特务彭钺和河口乡乡长、特务张铭声进行监视。工作队支部获悉后，即要何懋金等人暂时隐蔽。然而，何懋金一心为迎接解放。他将工作队员余泽民、罗玉琼二人安排到万县鱼泉中学和万县农业中学任教，隐蔽下来，自己仍留在第一线坚持斗争。

敌人的魔爪又一次伸向了革命者。1949年3月25日，继蒋开萍在万县城里被捕之后不到两天，何懋金在河口乡被捕了。接着，郝耀青也在当年4月被捕。

何懋金被捕后，河口乡的党员张成富、何宋冰等秘密开会决定利用自己的武装力量，借挑米进城为名，兵分两路进行拦截营救。可狡猾的敌人却临时改变路线，从长江水路将何懋金偷押至万县特委会，营救计划未能实现。

何懋金受尽了毒刑，但是，敌人面对的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钢铁战士。在敌人的一次次严刑拷打中，何懋金总是咬紧牙关，没有泄露任何秘密。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，保护工作队的同志们，保护他热爱着的农民兄弟，保守党的一切机密。当时住在关押地点的，有一个姓何的特务。其女儿在万县女子中学读书，英语成绩甚差，只考了二十几分。何的女人出面找何懋金帮她的女儿补习英语。何懋金利用这个机会，常常对她的女儿讲述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和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等，给她灌输进步思想，唤醒她不要走她父亲走过的反革命道路。

何懋金的坚贞不屈让敌人无计可施。在正义与勇敢面前，特务束手无策。这年5月，国民党万县特委会将他与蒋开萍、郝耀青转押至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监狱。

在狱中，敌人继续对他进行严刑拷打，甚至动用电刑，使他左手完全丧失活动能力，双眼也被电流烧坏了。但他仍然咬紧牙关，不向敌人吐露半个字。为了鼓励战友和振奋精神，他经常带领同志们高唱革命歌曲。每次受刑后回到牢房，他也要忍着剧痛，和难友们一起高唱《国际歌》、《山那边的天》、《跌倒算什么》等歌曲。

1949年11月27日深夜，大批特务突然集中来到渣滓洞集中营，将楼上8间牢



房的难友们，全部集中到楼下的7间牢房里。当大家正在猜测敌人的诡计时，突然，枪声大作，特务们从牢房的两头开始扫射。何懋金立即从上铺跳下来，伏在下铺老党员肖宗义的身上，使肖得以死里逃生。何懋金与他的亲密战友蒋开萍、郝耀青则当场壮烈牺牲。他年轻的热血，与同志们的鲜血汇流在一起，渗透了祖国苦难的西南大地，迎来了家乡的胜利解放。他用青春和生命演奏出一曲激越的战斗之歌！

（唐万宇 余泽民 何懋光 李英鸿）

郝耀青烈士——

血沃大地



郝耀青烈士

1949年11月27日深夜，一位中等身材，衣着朴素，戴着近视眼镜，面颊瘦削的年轻人双目圆睁，带着蔑视而愤怒的神色，面对敌人的枪口，倒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渣滓洞监狱的血泊中。热血奔涌，浸透了他无限眷恋的祖国大地，他就是国立四川大学理学院物理系1944级学生郝耀青。

追求进步读好书

郝耀青，1924年8月27日出生在万县凉风乡大浦池一个小康人家。6岁时，他